

博物馆是座宝库，也是一所学校

徐 坚

1905年，张謇创设南通博物院时，在苑中南馆题写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作为办馆宗旨。不久，在《南通博物院物品目录》里，张謇重申，“设苑为教育也”。虽然张謇掷地有声地开宗明义，但涉及的关键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博物馆人。博物馆究竟是一座宝库还是一所学校？

从西文词源看，博物馆天生与古典时代艺术收藏捆绑在一起。而在自《左传》以来的中文文献里，博物更偏向指宏大的知识体系。20世纪初的博物馆学学者提出，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公共性的现代文化现象。从诞生之时起，博物馆就是教育机构。当然，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议从未烟消云散。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博物馆是否依赖宝物，博物馆应该如何对待观众，物和观众在博物馆的天平里孰轻孰重，这也一直是1946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热议主题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从最初将博物馆定义为“保存、研究、强化技术性、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考古学价值物质”的“永久展览场所”，到2022年修改为“研究、收集、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

的“非营利永久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自我定位的教育色彩越来越突出。

当博物馆被喻为学校时，“博物馆是第二课堂”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常见观点认为，博物馆教育以实物带来的直观和形象特征见长，博物馆迄今都是各类学校组织实地教学的首选场所。但是，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并不是说它是教室的补充或者替代。虽然同为教育形式，但博物馆与学校截然不同，博物馆不能采用任何强制手段规训观众，观众充分享有用脚投票的权力，因此，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教育方式在博物馆里行不通。正因为认识到观众的主导地位，不少博物馆的社会教育部门将自身定位从“博物馆教育”调整为“博物馆学习”，从教育者视角调整为观众视角。

“第二课堂”拥有比学校教育更多的学生和更长的学习时间，学生拥有更大的主导权，也可能被激发出更大的参与度，博物馆是终身学习的场所。因此，博物馆需要吸引到观众，留住住观众，单靠网红展览或者爆款单品是不够的。

在居住和工作之外，提供充分的环境、文化和精神体验的空间被

称为“第三空间”。服务于广泛的终身教育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更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扎根社区，服务于文化认同和社区建设的社区博物馆就是博物馆转变为“第三空间”，实现终身学习的最佳案例。

社区博物馆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博物馆在最近数十年最显著的成就之一。从1998年建成的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展现出社区博物馆雏形开始，新世纪以来，社区博物馆在各地蓬勃涌现，上海曹杨新村改造和2021年开放的百禧公园更是成为社区博物馆激活15分钟生活圈和助力城市更新的典范。所有的社区博物馆都以基层社区为服务对象，以本土的物产、人物为馆藏和展陈来源，承载的也是本地社区的特殊知识和记忆。在大多数社区博物馆里，我们都能发现有谙熟本地历史和传统的志愿者开展乡土知识宣传和教，也能看到“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的高粘速度博物馆使用者。博物馆使用者往往集藏品来源提供者、阐释者、观众和推广者于一身。因此，社区博物馆很容易成长为凝聚社区的核心场

所，乡愁情绪在这里转变为乡土建设的动力。

“第三空间”不是地域纽带的专利，文化纽带同样可以实现聚拢观众，共建群体记忆和认同的目的。行业或者专题博物馆应该成为以行业、产业、经济和文化类别为基础的人群的“第三空间”。

值得称赞的是，建立在江西景德镇镇守备厂旧址上，甚至沿用了部分厂房的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没有遗忘半个世纪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的工人们。除了展示制瓷技术流程和瓷器产品之外，展厅里还有用瓷厂职工黑白证件照拼合成的照片墙，以及口述史采访视频保留的工厂以及城市的历史记忆。将在安徽淮南创建的煤炭博物馆和在新疆克拉玛依创建的石油博物馆也应该这样，只有将煤炭人和煤炭精神、石油人和石油精神有机地融入到博物馆的阐释和展陈之中，才能使博物馆最终锚定在社区、行业和人群之中。博物馆成为须臾不可离的终身教育场所的理由和价值正在于此。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家发现中国最南端暴龙超科化石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梦佳）暴龙超科是一类体型差异较大的掠食性兽脚类恐龙，是白垩纪中晚期的优势类群，霸王龙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科研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白垩纪研究》发表一项研究成果，将此前在广东省三水盆地发现的一批晚白垩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化石归入暴龙超科。研究人员称，这是三水盆地大型兽脚类的首次发现，也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地理位置最南端的暴龙超科化石。

此项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课题组联合广东省四会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以及广东中大深地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介绍，广东是中国白垩纪各种化石的重要产区，其中恐龙化石主要发现于广东的南雄盆地和河源地区，而三水盆地的恐龙化石记录很少。此次发现的化石为4枚牙齿，时代为晚白垩世最晚期，距今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

邢立达说，暴龙超科的物种体型差异较大，包含暴龙科与其更原始的近亲。全长可超过12米的晚白垩世霸王龙是其中体型最大，也是最著名的物种，但早白垩世的奇异帝龙全长仅约1.5米。根据此次发现的牙齿化石保守估计，牙齿主人的体长约5至6米或者更大一些的个体。

研究人员介绍，大部分兽脚类恐龙牙齿呈月牙状或香蕉状，中间宽并向两边收敛，收敛的末端形成隆突。此次发现的牙齿中有3枚发现于四会市，牙齿相对完整，牙冠长度均超过6厘米，另外一枚发现于广州市，为3.3厘米长的牙齿碎片。所有牙齿具有一致的形态特征，包括牙齿边缘有锯齿、锯齿密度较低、牙釉质光滑等，符合暴龙超科的牙齿特征。

据悉，华南地区一直鲜见晚白垩世大型兽脚类的记录，此前仅在江西赣州地区发现过暴龙超科的虔州龙和暴龙类足迹，广东河源地区发现过暴龙类牙齿等。三水盆地晚白垩世的恐龙化石记录还显示该区域活跃着伤齿龙类、窃蛋龙类和鸭嘴龙类等恐龙。“本次发现的暴龙超科牙齿和它们组成了一个恐龙生物群，说明在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前，恐龙生物群在我国华南地区很可能还相当繁荣。”邢立达说。

古董自行车博物馆：工业时代的车轮印记

自行车自发明之日起，就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如今骑行风靡，自行车仍如细胞般活跃在城市的街巷肌理之间。如果以18世纪70年代开始计算，穿越200年时光，自行车的双轮向前滚动了怎样的历史光谱？

地处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兰州市，有一座“古董自行车园林”——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占地超1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内，收藏着全球自1775年至1975年200年间的1300余辆古董自行车、自行车相关配件、历史文稿等105万件，自行车牌证89万件。

“自行车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典型产物，它既承载了工业时代的变迁，也鲜活了社会生活的印记。”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馆长柴林说。

走进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1861年的意大利雄鹰大小轮自行车、1896年的德国俾斯麦28型自行车、1911年的英国皇家空军跳伞车……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车型仿佛“盘活”了一部自行车轮上的世界工业史；陈列其中的红旗、飞鸽、凤凰、永久等耳熟能详的国产品牌自行车，也让人梦回上世纪中后期我国街头的摩登风潮。

柴林介绍，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自行车身上的汽笛、码表、蜡灯箱、反光板等都是用出厂原件原装配套，就是为了留存最完整真实的记忆。

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辆前高后低的木轮车，也称“走路机”。柴林介绍，这是1816年由德国发明家卡尔·冯·德赖斯制造的世界早期的木质、可转向的前轮曲柄自行车。卡尔·冯·德赖斯在一根木梁前后各安装了一只木轮，并在木梁上安上鞍座，骑车人坐在鞍座上，双脚交替蹬地前行，前轮装有“车把”，可以使车头左右摆动，掌握方向。

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内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辆“红马”牌国产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车身约长190厘米，坐垫至地面距离约95厘米，车把至地面约100厘米，轮径71厘米，整体结构看上去和“二八大杠”并无二致。

“这是上世纪20年代国内自行聘请日籍技工，并进口钢管、接头以及其他零件，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组合、焊接和油漆的第一批自行车，可以算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柴林说。

从“红马”牌自行车，到20世纪50年代自主研发的“飞鸽”牌自行车，再到集成国内自行车工艺的“新华”牌自行车等，博物馆藏品所呈现的正是中国自行车工业不断崛起发展的“活”的历史。

作为代步工具，自行车在发展的同时，也早已与社会生活紧紧交织。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自行车上牌制度，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制度才逐渐取消。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收集了当时使用过的牌照共89万件，以及自50年代以来我国对自行车颁布的全套管理条例、法律法规，以及对自行车制造厂家实施的技术规范等各类文字图片材料。

“这些物件虽有的斑驳，有的产生了锈迹或折痕，但其中的文字记载可以与藏品相互佐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柴林说。

自2019年免费对外开放以来，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年平均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年平均接待省内外研学团队超130个。

兰州市第四十六中学初一学生王瑛尧是一名骑行运动爱好者，周一他专门和同学们一起到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研学。“这座博物馆丰富了我对自行车的了解，下回我还要自己骑车再来！”他说。

“从世界范围内的自行车发展脉络来看，前人在一开始对自行车美学、力学、材料学等多学科原理的融合设计就是完美的，大的结构至今都未发生较大的变动。”柴林不断重复着他收藏展出的初衷，那就是让当代人能回望历史，通过学习前人的创新精神，展望未来。

（新华社电 记者徐皓夫、何问）

“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大型墓内，盘内壁绘龙纹，龙采用蛇身和鳄鱼头形象组合而成，由外向内盘绕，龙首位于陶盘的边缘处……龙口中衔着谷物，说明龙与农业的关系，表明陶寺遗址处于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厅内，来自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观众李女士正在参观“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在陶彩绘龙纹盘前驻足良久。

“旁边的展板上，介绍了陶寺文化以及陶盘的可能功用等信息。更细致的是，还有一幅随葬器物组合图。这些信息让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件文物，也能了解文物的发掘地点、出土位置以及考古知识等。”李女士说。

李女士的感受折射的是考古成果如何更好地在博物馆内得到呈现，为公众所共享。



适逢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江西省吉安市市神岗山学校组织学生到吉安市博物馆参观，感受历史文化魅力。图为学生在吉安市博物馆参观。李 军摄（人民视觉）

考古文博专家研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考古大众化的主要形式

在日前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新时代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考古文博机构、高校的学者围绕考古学、博物馆学融合发展进行交流研讨，“加强考古成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与与会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会学者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重要桥梁。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作为两门紧密相关的学科，长期以来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为人类文明传承及相关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促进考古学综合研究阐释工作，还加强考古成果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认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是当前考古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前沿课题。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考古

与博物馆深度融合是一个关键。博物馆既有对考古成果的转化，又有对考古资料的提升，是考古大众化的主要形式和主渠道。

展陈与考古学有机结合

在展陈内容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方面，许多博物馆积极探索并努力实践，对文物背后的考古知识、方法、过程以及文物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阐释。

于去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的特色是“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将考古发掘出土物以遗址、遗迹为中心密集式陈列，古籍、档案则呈阵列式展出，就体现了考古学的学科特色。

据中国考古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考古学研究往往是整体地考察一定时间内分布于一定区域，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即按照考古学文化来研究，着重于遗迹和遗物的系列和类型，而不是孤立地、鉴赏式地研究单个器物。这样的学科特点使得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充分考虑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遗迹单位，以精品文物与成组器物的有机融合、线图描绘与图版说明的辅助铺陈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生产技术水

平、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等形成与发展的考古学解读。展厅中仓储式展柜展架密集式陈列与独立柜的多角度展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的结果。

今年2月，以殷墟大遗址考古发现为展陈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在河南安阳对公众开放，展陈以考古人扎实的田野发掘和学术研究为基础。

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研究员张晓玮撰文指出，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成开放及时为殷墟考古和研究成果提供了全新平台，打通了殷商考古出土文物从发掘现场到考古研究机构再到博物馆的时空路径。一方面，殷墟考古成果的有力呈现，有助于博物馆深化对考古成果的认识、解读、阐释和传播；另一方面也拓展了遗址公共服务空间，为实现殷墟大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高质量保护及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所说，考古学史、考古理论方法、考古的技术设备、考古成果等应是博物馆的重要展示内容，博物馆则提升了考古学科、考古科研机构的公共服务的。

科技助力成果展示更立体

为了拉近博物馆和考古成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利用现代科技，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创新展览形式和服务手段。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展出的石龙纹磐，通过立体展示描绘出磐上的龙纹，留住了不少观众的脚步。“这个特别的展示把文物的细节都呈现出来了，很震撼。除了这件，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形器等也配了立体展示，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李女士说。

科技助力考古成果在博物馆展示的例子不胜枚举。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利用智能体感捕捉、VR互动、三维打印等各类新手段，实现趣味

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设立裸眼3D、沉浸式数字展厅、电子互动屏等，赋予文物新的表达方式，提升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广度、深度、精度，构建文物、历史与数字虚拟空间交互场所，给予游客更加直观的体验。

“例如，将郑州商城的杜岭方鼎、山东苏埠屯的亚醜青铜觚、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等20多件商代珍贵文物，通过裸眼3D技术在同一空间呈现，让人们多维度、立体化、沉浸式感受商文明传承和甲骨文魅力。”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通过具体案例介绍了新技术带给观众的别样观展体验。

相关专家表示，高科技的应用不仅让观众有了全新的观展体验，还让考古成果在博物馆的呈现更加立体、丰富，拓宽了人们认识历史、理解文化的视野。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展出的陶尊形器通过科技手段呈现更多细节。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内展出的刻辞卜甲。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